

统一性：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

□主讲人：王学典



▲王学典

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命题、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。其中最富有理论含量和解释空间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。这个命题提出之后，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，一批文章从各个角度、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上、思想上的探讨。

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，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。也就是说，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，我们能否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范式？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。

所谓中国式现代化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。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？这一社会政治体制从学理上，即从政治学、管理学上如何把握？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首先与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。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、理论逻辑、实践逻辑，就必须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。

那么，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？我概括为三点：

第一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、超大规模的国家。中国拥有

14亿人口，横跨温带、热带、寒带，从地理空间上讲非常复杂。这样一个超大规模、超大规模、超大型的国家，总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难度和发展问题。量变引起质变，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，完全有道理。

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、现代化发展和一个2000万人口、5000万人口、6000万人口的国家治理、现代化发展不可同日而语。在性质上，在治理难度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。大家可以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来理解这个问题。比如，我要办20个人的会议，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所谓的接待小组、学术组。如果我要办一个100人的会议，我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队伍，接待组、学术组，还有其他的小组去管理这个会议。那么如果我办一个500人的会议，当然情况更不一样。规模大小和管理难度的高低呈正相关。中国是一个超大型、超大规模的国家，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国情。

第二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。从中华民国一建立，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一个口号“五族共和”，汉族、满族、蒙古族、藏族、回族五族共和。中国的少数民族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

的历史和文化，甚至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字。那么既然是多民族，就必须在政策上有差别，不能一刀切。要考虑很多变量，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带来一系列特殊的复杂性。

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大多数民族聚居在一起。比如新疆大部分是维吾尔族，内蒙古大部分是蒙古族，西藏大部分是藏族。这是第二点特殊的国情。聚居和杂居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不可同日而语。

第三，中国是个长历史的国家。中国有着久远文明体系。学术界认为，在5000多年历史当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，像古埃及、两河流域、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，这是常识，不必多说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

历史长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包袱重，有积淀，凡是有超长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但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，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，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。中国有着独特的传统、独特的文化、独特的表达符号——汉字，独特的艺术审美。一个有



《文史哲》

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，就像一所百年老校一样，没办法完全推倒重建，只能见缝插针、修修补补，无法做到整齐划一，所以会由此带来特殊的管理难度。

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这个国情给中国带来了特殊的治理难度和诸多发展问题，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理念和传统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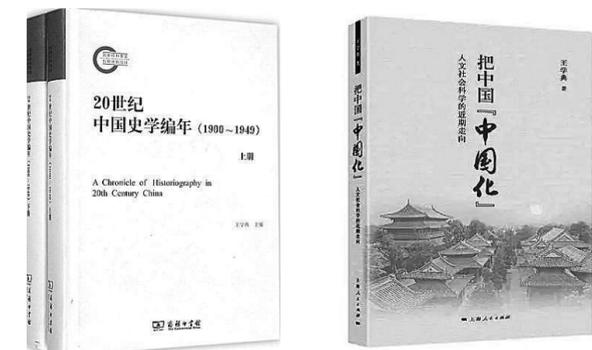
大优势，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、命脉所在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、幸福所系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特别规定，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。对此一些西方人不理解，他们不理解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出于价值观的不同；另一方面是他们不理解中国特殊的历史轨道。

如上所说，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状况。而要驾驭这个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的国家，必须依赖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。

基于国情的治理体系与传统

在中国古代，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力量，主要是皇权。皇权力量虽然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，但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。1912年推翻帝制之后，中国陷入军阀混战，一盘散沙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结果？关键在于，管控这个社会的有组织的核心力量突然出现了真空。重建掌控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一个重大任务。

事实上，从国民政府时期开始，就想重建掌控国家的这一力量。在现代制度框架之下，这一力量只能以政党的形式出现。政党是按照特定的政治理念、特定的纪律原则组织起来的。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，并从实际行动上就要重新建立这个力量。“三民主义”——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，就是其政治理念。但是国民党缺乏铁的纪律。后来，孙中山先生提出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，由于是一个松散的联盟，国民党始终没能完成“核心力量”的重建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这一重建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的。中国从



▲王学典部分学术著作

此重建了一种能够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力量，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。我们需要从学术上，包括政治学、管理学上去理解这个问题。

总之，驾驭这样一个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的国家，必须依赖有组

织的力量。这个有组织的力量，要么按照血缘原则来组织，比如在中国古代；要么按照政治原则来组织。而这个重建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完成了，这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“党的领导”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确立

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
我经常打比方说，中国社会、中国历史好比一辆有轨电车，自古以来有固定的轨道。这辆从5000多年前开过来的电车，无法沿着西方式的民主框架走。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从古至今是历史的规定。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？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规定，放在国家治理体系规定的核心地位？就是因为中国社会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。

由于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的特殊国情，我们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，其表现就是大一统的国家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“大一统”的理念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想总结。

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始终维系、维护这样一个统一的局面？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三点：第一，这片土地必须统一，这是5000多年历史造成的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。只要是中国人，这个观念从潜意识里就牢不可破。

第二，如果这片土地发生分裂，一定会兵连祸结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各个社会阶层都将无法幸免于难，文明果实都会在分裂中化为灰烬。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，是这一看法的鲜明例证。第三，任何一个政权、任何一个朝代，都必须有义务来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局面。如果哪个朝代、哪个政权、哪届政府无法维系这种大一统局面，严格地讲，它就在中国丧失了执政的合理性、合法性。

中国自古以来的“大一统”观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是巨大的治理需要造就了当下的治理结构，是这片土地的稳定需要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。这片土地要维护统一，不能分裂。西方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，是需要或功能造就结构，而不是结构造就需要，并不是由结构派生出相应功能。治理结构、社会政治结构是什么样是由需求来决定，由功能来决定。总之，是我们这个超大型、多民族、长历史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核心力量来掌控，需要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维系、来治理。当下依然如此，甚至尤其如此。

“统一性”植根于中华文化

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“大一统”观念，而且其政府必须有义务来维系这个局面？我觉得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，是儒家提供了这个观念，是孔孟之道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。

孔子周游列国的全部追求是再造秩序，重建秩序，恢复周礼。而周礼就是一个社会秩序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。孔子经常梦见周公，他认为周公是这个理想体系最好的代表人物。孔孟之道在历史上也被称为“周孔之道”，因为孔子是按照周公的理念去应对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的局面。孔子对“礼崩乐坏”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痛心疾首。他认为按照周礼，礼乐征伐应该自天子出，不能自诸侯出。当然他对于从何处着手重建秩序有一套自己的理想想法，尽管当时那些诸侯王并不接受他的主张。孔子《论语》的背后都是对秩序的追求，对“礼治”的追求，对稳定的追求，对“大一统”的追求。

不仅孔子，孟子也是这样。孟子跟梁惠王对话的时候，梁惠王专门向孟子请教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会是什么样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孟子说“定于一”，必须走向统一，必须重建天下的秩序。董仲舒在汉武帝

时期，作为一个国师提供治国的方案，他的《天人三策》专门说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”在他看来，大一统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，而且要放之古今而皆准。这是所有儒家的追求，大一统这种观念是儒家的主要观念之一，这个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“大一统”观念就是儒学带给中国人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，只要读《论语》，就会不知不觉接受这种观念。只要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就会不知不觉接受这种观念。在从事历史创造的时候，就是这种不知不觉接受观念在起支配作用。这种牢不可破的、种在我们脑子里的、实实在在的大一统观念，相当程度上是儒家传播而来。“二十四史”把儒家这种观念完全化作具体的编纂。那么“二十四史”为什么是本纪、世家、列传的结构而不是另外的结构，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结构的折射。这个历史编纂的背后是什么？是儒家的观念、是大一统的观念、是正统的观念。

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观念？这又牵扯到对儒家思想学科属性的认识。儒家为什么一定要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？这是儒家之所以成为儒家本质所在。儒家是

一个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的思想流派，把民族和国家担在自己肩上，所谓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我个人感觉，儒家思想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。儒学不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，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哲学。格物致知也好，修身齐家也好，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。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、大同、天下为公、治国平天下。把社会、历史扛在肩上，把国家发展、民族统一和文明延续扛在自己肩上，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：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，强调“必须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、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融通起来”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虽然从主张来讲是近期提出来的，但绝不意味着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生联系，只是我们现在更自觉了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对统一的执着，说明我们早已接受并继承了“大一统”的观念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

继承者、继承人，这句话是有内涵的。大一统的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被接受下来。这也是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天依然具有很高价值的地方，是值得我们在社会治理上高度关注的问题。

中国社会、中国历史是一辆有轨电车，自古以来有它固定的轨道。我们沿着这条轨道，用了5000多年时间，从古

代社会走到了现代社会。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条轨道的独特性和有效性，也证明了中国不可分裂、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离散、中华文化不可消解。这条由中国历史、国情和观念所决定的轨道就是“中国道路”，这条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。未来我们必定还会沿着这条轨道奋进前行，继续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！

相关链接

主讲人简介：

王学典，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、《文史哲》杂志主编。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、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现代学术史研究。出版有《把中国“中国化”：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》《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》《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》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》《萧伯赞学术思想评传》《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》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，并主编有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》《史学引论》等。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，多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。知名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专家。



扫码听讲

编者的话：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、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，决定了国土不可分、国家不可乱、民族不可散、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，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，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。本期讲坛邀请王学典常委就此话题进行深入讲述。

